

媒体城市

The Media City

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
Media,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

[澳]斯科特·麦奎尔 著
邵文实 译

邵文实 译

ated an urban dweller who intellectualism was a carapace gro-
aos of big city life. Impersonal
netable which coordinates the
muters, become the key to the
over-stimulation. The dark
(178) calls the 'blasé attitude'
capacity thus emerges to re-
This constitutes the blasé
shows when compared with
us.¹³

Simmel locates the blasé
effect of the mature mo-
Marx's (1977: 229) fam-
which described money
(178) adds:

essence of the blasé attitude re-
not mean that objects are not
either that the meaning and
themselves, are experienced

mel (1997: 179), the big
ations, is where the blasé
the main seats of the mor-
to the fore much more im-
ny cities are also the genuine

媒体城市

The Media City

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

Media,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pace

[澳] 斯科特·麦奎尔 著

邵文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体城市 / 张鸿雁、顾华明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1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ISBN 978-7-5499-3641-0

I. ①媒… II. ①张…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 IV. ①C91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572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SAGE McQuire, 2008.

书 名 媒体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

著 者 [澳]斯科特·麦奎尔

译 者 邵文实

责任编辑 丁 维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2 000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3641-0

定 价 40.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taoba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45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主 编 张鸿雁 顾华明
副主编 王爱松

序

张鸿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城市化的发展既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国家各自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独有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侧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①经典作家认为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历程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例外。^②同样，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历史经验也证明，要想使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够健康发展并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何桂全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

② 张鸿雁、谢静，《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创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特别要择优汲取西方城市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以避免走弯路。^① 我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借此机会把我以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观点和认识重新提出来供读者参考。

一、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优化选择

201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2%，正在接近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关键是，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将仍然处于继续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的社会变迁期。这一典型的社会变迁——中国新型城镇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质量以及社会的公平问题。

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适度紧缩的城市发展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拼贴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花园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以及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等，这些成就对人类城市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推进人类城市化的进化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中国城市化需要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理论进行扬弃性的运用，从而最终能够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面对有些问题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在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在当代仍然存在着普遍的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②，而且在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也都

^①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3。

^② 参见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集中在城市，形成典型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城市贫困、城市就业、城市住房、城市老人社会、城市社会犯罪、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与就业空间的分离、城市中心区衰落以及城市蔓延化等问题，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社会中不断发生。这些现象的发生，与我们缺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全面理解与择优运用有关。

在建构中国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外来城市化理论进行比较地、批判性地筛选，这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方式。西方城市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①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近80%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回顾以往，在某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21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严重误读。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②。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

① 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②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南美洲巴西等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国家人口总数的34%。一方面是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势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人口增加……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参见：王建平，“避免‘拉美陷阱’”，《资料通讯》，2004(4)，46。

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少地多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要么是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①，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

二、中西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认知

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形成高速的城市化。所谓“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与城市战略的规划是政府管控的；二是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投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三是城市化的人口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的；四是城市的土地是由政府掌握的，等等。这一动力模式具有强大的权力力量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典型的行政命令的弱点。中国城市化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跃然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城市化路程，成就令世界瞩目，

^① 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白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4~25。

但城市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实，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城市理论来引导。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长入”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距”与“文化堕距”。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中世纪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进行中国式的“第三次土地革命”^①，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中。

① 张鸿雁，“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第六次城市革命”，《城市问题》，2008.1。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过程^①，这种变迁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进步型的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是这一变迁的继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化的进化型变迁中，在解决传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没有不存在问题的社会，亦如发展本身就是问题，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命题一样，社会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因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历史的空前绝后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繁杂：有些是传统社会问题，即没有城镇化也存在；有些是城镇化引发和激化了的问题，要梳理出关键点加以解决。

“当我们渐近 20 世纪的尾声之时，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② 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英格拉姆在研究公共管理体制体制改革模式时的一段论述。正因为如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和声势不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同一层次的认知方式，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的方式。亨廷顿曾针对性地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提出这样的分析：“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着“政党与城乡差别”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现实正是“城乡差异”二元结构深刻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都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

^① 张鸿雁等，《1949 中国城市：五千年的历史切面》。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②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9。

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建构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城市市民社会。

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①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对于城市的“伟大”认知不止于斯宾格勒，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②我惊叹于四百多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独到而精辟的论述，虽然这种论述包含着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论者能够从独立的视野中发现城市的价值实是难能可贵。而且，四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也充分证实了这种美誉式的判断。同样，也是在四百多年前，乔万尼·波特若还提出了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途径：“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③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再创造，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我国的城市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9。

②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③ 同上。

有助于形成并完善我们自己城市理论的系统建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新型的城镇化过程中，避免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失误。新型城镇化是在建立一种新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的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①

该丛书引进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大致涵盖了相关领域的重要主题，它以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等特点，带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与启发。

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城市化实践经验，研究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化管理体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功能。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丛书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也借此请教大方之家。读者如果能够从中获取一二，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院长
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会长
(2013年11月于慎独斋)

^①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19。

鸣 谢

有些书写得比另一些书快。这是本厚积薄发的书。我在 1998 年左右开始形成想法，可实质性的工作直到 2004 年才开始。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注意力被许多事情所分散——其他的研究计划，其他的著作，几份新工作，两个孩子的出生，我挚爱的父亲的离世。这一延长的酝酿过程使我有更长的时间得以观察我开始思考的那一进程的深化。它还意味着，我要感谢许多在这一计划完成过程中提供了帮助的人。我尤其要感谢 Peter Lyssiotis 和 Don Miller，我在多年以前就跟他们一起开始观看城市电影。我还要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在其间得到预演的各种研讨课和会议中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包括在新南威尔士艺术画廊举办的“空间远行”讨论会和澳大利亚移动图像中心的“深度空间”的组织者 Victoria Lynn；塔斯马尼亚大学霍巴特艺术学院的 Colin Langridge；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 Suzie Attiwill 和 Pia Ednie-Brown；戈德史密斯学院的 John Hutnyk；新南威尔士大学的 James Donald；阿姆斯特丹“城市之屏”大会的组织者 Mirjam Struppek 和 Geert Lovink。我还要感谢 Rafael Lozano-Hemmer，David Shephard 和 Eva Riehl 允许我翻印图片。扩充段落的重印得到了来自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4, 1938~1940 的出版商的允许，该书的编辑是 Howard Eiland 和 Michael W. Jennings，翻译者为 Edmund Jephcott 和马萨诸塞州坎布利奇市的其他人（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我要深深地感谢我在墨尔本大学的同事和研究生们。我要特别感谢 Meredith Martin 的慷慨无私、轻松幽默和创意十足的辅助研究，感谢与我分享了那么多东西的 Nikos Papastergiadis。感谢 Mike Featherstone 从一开始就对此项目充满兴趣。本研究的部分内容的雏形已发表

在《空间远行》(*Space Odysseys*)的展出目录、《文化研究评论》(*Cultural Studies Review*)、《扫描》(*Scan*)、《空间与文化》(*Space and Culture*)和《第一个星期一》(*First Monday*)之上。来自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为此项目提供了帮助，墨尔本大学则为本项目提供了研究假期。在个人层面上，我要深切地感谢 Brunswick 的修女们，尤其是 Bec, Mary-Anne 和 Maja，她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她为我照看 Lachie 和 Alistair，提供了异常慷慨的务实支持。我最大的拥抱给予使这一过程变得无比丰富多彩的 Lachie 和 Alistair。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 Sarah，她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项目的所有阶段——这本书是献给你的。

前言

21 世纪的社会生活日益成为生活在媒体城市中的生活。这句话同时表明了两件事。首先，当代城市的空间和节奏与在城市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有所描述的空间和节奏截然不同。其次，媒体的变化像城市的变化一样多。我在本书中展开的一个泛论是，日趋流动、即时并渗入城市空间的媒体集合，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体验模式的构成框架。我并未将媒体视为某种与城市相分离的事物——通过将都市现象转变为图像的方式来“表现”它的媒体——相反，我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空间体验经由建筑结构与都市领地、社会实践和媒体反馈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相互构造过程而崛起。当代城市是个媒体-建筑复合体 (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它源于空间化了的媒体平台的激增和杂合的空间整体的生产。尽管至少自 19 世纪中叶“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技术图像发展之日起，这一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中，但其充分的含义直到数字网络得到扩展之时才逐渐为人所知。在这一方面，就列斐伏尔 (Lefebvre, 1991) 对空间的具有约束力的影响和认知的意义上而言，媒体城市这一术语旨在凸显媒体技术在当代城市空间的动态生产中的作用。

虽然诸如“信息城市”或“数字城市”之类的术语更为现成，但媒体城市之所以成为我的战略选择，基于三个原因。首先，我认为，相对于密切关注当代信息与通讯技术 (ICTs) 所带来的结果，认识经过城市空间媒介化生产的更悠久和更多样化的历史可谓至关重要。换言之，“媒体城市”的形成为时漫长，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历了多次不同

的更迭。我的部分论点是，现代城市空间的独特实例一直以来通过特殊的媒介平台得到了清晰表达，这些媒介平台始自 19 世纪中叶的摄影，然后转向 20 世纪初期的电影，更近些时候则转向了电子和数字媒介。虽说这绝非是一种格式在其间会简单地取代另一种格式的线性的连续过程，但在清楚地说明影响都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的关键转变方面，这些宽泛的界限却依然有用。其次，我的兴趣更多地在空间体验的转变，而非通过公司组织和劳动力构成来塑造城市主义的经济力量——对于这些主题，像卡斯特尔（Castells）、哈维（Harvey）和萨森（Sassen）这样的作者已予以了集中关注。出于这一原因，我发现既将“媒体”视为麦克卢汉（McLuhan）所说的环境，同时又将城市视为基特勒（Kittler, 1996）所说的“介质”，会更为有益。我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由构成现代城市特征的技术、建筑和新兴社会关系间的独特纽带所建构的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三，我想强调计算机和远程通讯与诸如摄影、电影、电视之类的老式媒体的日益聚合。这种与其说是整体的不如说是不均衡的聚合，已经改变了媒体的场所和社会功能。在此过程中，它已催生了生产社会空间的新手段，造就了社会能动性的新形式，而这些潜质正在迅速成为 21 世纪城市的整体维度。

本书的结构，围绕一篇导言及三个主要部分构成。导言提供了一些思考当代城市中的社会空间转变的概念性符号。其余章节更多地致力于潜入这些方法在不同历史状况中的逻辑，而非对它们的“应用”。第一部分的主导话题是“大城市生活”与处于特殊历史阈限内的新媒体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探讨公共空间的转变，而第三部分关注的是私人空间的重构。很明显，这些内容互有交叉，而非相互各奔东西。虽然每一章都自有其轨迹和连贯性，但我希望，它们会形成一种集体共鸣，能够揭示现代和当代城市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不同面相。尽管本书具有实际的历史关注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起源是当前的数字媒体的时空影响。在我致力于将此状况加以理论化的过程中，我受到许多作者的引导，包括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西格弗

里德·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保罗·维利里奥 (Paul Virilio) 和斯科特·拉什 (Scott Lash)。但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本雅明于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形成的理解新媒体与大城市生活间的关系的先锋方法, 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尤其是他对他称之为“十字路口”现象的摇摆不定的政治潮流的关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数字媒体的繁荣导致了无孔不入的“网络”语言, 其特征是目空一切地预言: 时间和空间都将“消失”。在第一章, 我将这种我称为“时空歼灭”论的言论的突然出现放在适当的上下文中, 将其当作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新媒体技术的循环反应。然而, 尽管我想超越对新媒体的理想主义的反应, 但我并不想走得太远, 乃至使由媒体与城市主义间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新兴现象消失在“理所当然”之中。我更愿意做的是, 遵循本雅明对“十字路口”现象的关注, 使本书的每一章都围绕媒体技术与城市形式间的关联纽带中的一个特殊阈限来组织。此阈限指一种临界期, 在其间, 处于那一时空的社会关系尚未完全就位, 而是滑动、矛盾和论争的替代主题。我的个案研究包括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奥斯曼 (Haussmann) 的“现代化”巴黎的拍摄 (第二章) 和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城市空间的电气照明 (第五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现代派玻璃房屋 (第七章) 和城市交响乐电影 (第三章); 最后是电脑和数字媒体对当前城市 (第四章)、公共空间 (第六章) 和私人住宅 (第八章) 的有改造作用的影响。这些不同快照的时机选择, 部分是为了记录贯穿那一时期的重大社会经济转型, 即大规模商品生产的最初兴起、工业生产的福特制-泰勒制逻辑的出现, 以及向后工业的全球信息社会的过渡。但将这些不同时刻聚集在一起的首要意图, 是指明媒体-建筑复合体的出现, 即我所说的媒体城市的崛起。它还旨在勾勒这种新格局的纠结于乌托邦式的抱负和世俗的 (即使不是怀有恶意的) 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游移。